

全球化时代中的儒学创新

杜维明的现代新儒学思想

魏彩霞 著



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获得浙江省教育厅2004年社科课题资助

全球化时代中的儒学创新

杜维明的现代新儒学思想

魏彩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时代中的儒学创新：杜维明的现代新儒学思想/
魏彩霞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2
ISBN 7-5004-4859-7

I. 全… II. 魏… III. 杜维明-儒家-哲学思想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6359 号

特约编辑 钟 惠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王 卿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插 页 2

字 数 238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但在精神文化领域却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犯罪率增高，社会道德沦丧，这都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因此，要想重树人们的道德伦理规范，加强人们的精神文明修养，就需要挖掘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资源。在这方面，一直致力于寻求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现代新儒家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尤其是最近 20 多年来，以杜维明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更以其良好的中西方哲学素养、积极客观的心态和高瞻远瞩的视野为世人所瞩目，他们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共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来探索儒家思想现代价值的学说也就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因此，对他们的思想和学说作一番研究就很有必要。

80 年代初，在杜维明等现代新儒家的宣传鼓动下，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儒学，并掀起了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大讨论。而现代新儒家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为此，不但召开了多次以现代新儒家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会议，还出版了大量刊物，如：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5 年版）；郑家栋的《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郑家栋的《现代新儒学概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方克立、李锦全的《现代新儒学论

集》(一、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

以上这些著作都是以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第二代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以杜维明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关注则较少,不仅专著寥寥无几,少数公开发表的论文也多为几人合论,对杜维明个人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这不但影响了人们对以杜维明为首的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趋向和思想特色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影响到了对其整体的、客观的评价。本书试图通过对杜维明近20多年来思想学说的梳理和研究,进一步凸显出海外现代新儒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动向,从而为我们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借鉴。

杜维明的学术思想资源比较丰富,近20年来他出版了不少专著与学术论文,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总的来看,他的主要思想包括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关于儒家真精神的现代转化。在杜维明看来,要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就必须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对阻碍儒学真精神现代转化的阴暗面进行深入的批判,为儒家心性之学的现代转化进一步扫清道路。任何一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必须批判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杜维明对此表现出了积极客观的心态,但是儒家心性之学是否就是儒家真精神还有待商榷。

其次,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杜维明认为我们应积极吸收西方启蒙心态创造的诸如科学民主、自由法律等中国文化缺少但又是现代化所必需的普世性价值。在这方面,杜维明放弃了唐君毅、牟宗三等前辈现代新儒家在儒家思想内部寻找科学民主种子、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路,而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探索儒家与西方普世性价值优势互补的可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杜维明更加强调应该正视启蒙价值的负面影响,即人类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产生的足以将人类毁灭的世界难题。对此,儒家的人文主义应该在构建全球伦理的过程发挥积极的作用。虽然儒家到

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有待研究，但是，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为儒家的现代转化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和舞台。

再次，对于如何排除欧洲中心主义，杜维明认为，在肯定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同时也应该积极探索其它的现代化模式。其中，儒学作为世界传统文化资源中的重要一支，也可以成为现代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为世界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杜维明从三个方面做了探索：首先，他借鉴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观点来说明儒家在现代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他反驳了儒家博物馆论和儒家威胁论两种错误观点；其次，他还对西方基督教神学、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学及社会学的新发展趋势与儒学可能的结合作出了探索，试图将儒家介绍给希望突破欧洲中心主义思考模式的西方学者，从而扩大儒家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再次，他虽然否认儒家思想与工业东亚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他仍然认为工业东亚已经发展出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可为世界其它文化提供借鉴的现代化模式，并对其中儒家文化的影响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第四，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杜维明则挖掘了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在他看来，儒家这种既不排斥天道又不征服自然的“天人合一”观念正好能够弥补现代社会的这一缺陷。杜放弃了那种受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影响的一元上帝的狭义宗教观，吸纳了西方学者将宗教视为“某一信仰共同体精神上自我认同”这一比较宽泛的理解，着重从“诚”、“仁”与“礼”、儒家论学做人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儒家“内在而超越”的宗教性。与前辈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相比，杜维明不再主张把儒学视为超越于各类宗教之上的“一般宗教之基础”，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寻求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传统之间相互沟通、借鉴的具体途径。

最后，根据儒学在思想文化方面以及现实层次上新的发展趋势，杜维明阐发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在此基础上，他进而

提出“文化中国”的建构问题。至于如何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杜维明又对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儒家公众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他看来，公众知识分子是否具有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是其关键所在。当然，在儒门淡漠的今天，试图通过公众知识分子的表率作用来推广儒学似乎过于乐观，但是其对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责任的认知还是有诸多借鉴之处的。

虽然杜维明在国内非常活跃，其著作在国内也出版了很多，但是，在学术界还没有一部以杜维明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杜维明作为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积极与世界其他文化传统中的顶级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探讨他的思想可以找到儒学在全球化时代中新的切入点和发展空间。因此，本书基于这一出发点，对杜维明的新儒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

学术界一般认为，杜维明等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兴趣不在于某种理论模式和哲学体系的建构，但是，经过对其近20年所发表的诸多论文和专著的研读与分析，我发现其思想还是有内在逻辑的，本书就是根据这一逻辑体系阐述成文。关于此专著，本人在杜维明先生自美来杭期间，曾与其作过长达4个多小时的面谈，他对本文的主要观点给予了肯定，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再次向杜维明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1)
一 杜维明：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3)
二 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新特色	(7)
(一) 淡漠的道统观念	(9)
(二) 多元文化中的儒学创新	(12)
三 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两种不同发展方向	(16)
(一) 成中英、余英时：注重儒学的知识理性	(18)
(二) 杜维明、刘述先：强调儒学的超越性	(21)
第一章 杜维明论儒家的真精神	(25)
一 继承五四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	(27)
(一) 五四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启蒙运动	(27)
(二) 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批判	(30)
(三) 继承五四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36)
二 区分封建意识形态与儒家的真精神	(41)
(一) 区分政治化儒家与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	(41)
(二) 儒家的心性之学是儒家传统的真精神	(46)
第二章 吸收启蒙价值 反思启蒙心态	(53)
一 全球化与本土化时代的到来	(53)
二 吸收西方的普世性价值	(55)

(一) 前辈现代新儒家论儒家传统与科学、民主观念的结合	(57)
(二) 杜维明论儒家传统与科学民主的结合	(64)
三 反思启蒙心态 发扬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 建构世界伦理	(82)
(一) 反思启蒙心态	(82)
(二) 发扬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 建构全球伦理	(89)
第三章 超越欧洲中心主义 寻求儒学的现代转化	(104)
一 “轴心时代”理论说明: 儒学在现代仍可发挥作用	(105)
(一) 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	(105)
(二) 批驳国际上对儒学的两种误解	(109)
二 东西方思想文化的融合	(112)
三 儒家文化与工业东亚的崛起	(117)
(一) 工业东亚的崛起引起世界学者的关注	(117)
(二) 马克斯·韦伯的“儒家阻碍经济发展”论受到挑战	(121)
(三) 儒家与工业东亚的关系	(134)
第四章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发掘儒学的宗教性	(147)
一 儒家人文主义思想可救治人类中心主义	(147)
(一)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147)
(二) 新儒家人文主义生态转向的本质	(154)
二 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	(159)
(一) 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宗教性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160)
(二) 杜维明强调儒学具有宗教性的社会原因	(183)
(三) 儒学的宗教性: 作为群体行为的终极自我转化	(194)

第五章 杜维明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	(228)
一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	(228)
(一) 儒家传统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化的挑战	(230)
(二)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具体“设想”	(235)
(三) “文化中国”的设想.....	(242)
二 杜维明论现代新儒家知识分子自我定位	(255)
(一) 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	(256)
(二) 杜维明论关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261)
(三) 杜维明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 ...	(270)
附录一 杜维明年谱简编	(284)
附录二 参考书目与文献	(287)

绪 论

一百多年来，由于中国的落后，儒家思想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一直是作为弱势文化而存在的。虽然少数近代西方学者对它有所关注，但大多数人都将它作为一种已经失去生命力的文化形式来进行研究，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的列文森教授、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等人。近二三十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转变，正如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上世纪80年代所说：“十多年来，孔子频频出现在太平洋两岸的无线电波中，从新加坡到华盛顿的全美文理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总部。”^①不但对儒家思想进行深入研究者日益增多，甚至还有西方学者自称为儒家式的基督徒，如美国学者南乐山等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转变，不仅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密切相关，也与第三代学者的大力宣传不无关系。

在这些第三代学者中，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就是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现代新儒家”是目前大陆学术界对这些第三代学者的通行称谓，主要包括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成中英等人。可以说，他们在中国文化社群以及世界范围内弘扬儒学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又尤以杜维明为主要代表。如

① [美] 阿里夫·德里克著，王宁等译：《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1985年，杜在北京大学任访问教授期间的谈话结集出版后，大大激发了国内学术界对儒学的兴趣。同时，他还和其他人（多数来自哈佛）一起参与了全美文理研究院的“崛起的东亚”研究，举行了一系列专题讨论会，吸引了各种国际组织，扩大了儒学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正是在80年代，新加坡开始在高中大力推行儒家伦理教学，日本文部省启动了支援大专院校从事探讨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关系的十年计划，韩国退溪学会全面展开了儒学国际化活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也开始组织儒学研究队伍。近年来，杜维明更是频繁往来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欧洲等地，积极出席在世界各地举行的有关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学术讨论会，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与各种不同的对象（中老年学者和青年学者、专业学者和非专业学者乃至新加坡政府的高级官员）进行对话，积极阐发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使“儒学复兴”说成为80年代中期文化讨论中的一派显学，并在社会上引起热烈讨论。正是通过杜维明这种所谓的“脑力震荡”和“漫步讲学”活动，儒学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誉迅速抬升。如方克立先生就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绝响30年后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和杜维明的讲学和宣传活动是分不开的”。^①

总之，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不但扩大了儒家传统在世界上的影响，成为推动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他们新的时代条件下出现了新的发展特色。因此，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一番梳理，不但可以开拓我们的研究思路，也可为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诸多借鉴。

^①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一 杜维明：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对于如何界定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问题，不同学者的见解也不尽相同。如成中英先生就否认自己是现代新儒家，在他看来，“新儒家与新儒学”是有区别的：新儒学是“跳出固定的儒家传统讲”，而新儒家则是“接着一个儒家传统讲儒家”。也就是说，“新儒学”是泛指整个现、当代儒学研究，而“新儒家”则特指当代研究儒学的某个特定的群体。按照这个标准，当代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儒家学说，从而对它“作出力图公平而恰当的评价以为个人理解、行为或公共政策的参考”，就只能纳入“新儒学”；相反，当代学者若“在已经确认或坚信的价值基础上发展和创立一套思想的体系或命题，倡议其普遍真理性和必要性”，则应纳入“新儒家”。^① 根据这一区分，成中英将自己纳入了现代新儒学研究者的阵营。与他不同的是，杜维明则对自己的现代新儒家身份欣然接受。

那么，现代新儒家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颜炳罡认为，儒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坚持道德优先原则，这就是“留意于仁义之际”；（2）同情地了解儒家经典，以教授儒家经典为自己的本分，也就是所谓的“游于六经之中”；（3）宗师孔子，即“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当然，具备这些条件还只是现代新儒家的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现代新儒家还必须具有“新”的意义。所以他认为，当代新儒家所呈现出的形态、气象或内容之“新”也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来看。从外在来看，至少有如下两点：（1）与传统儒者相

^① 参见成中英《当代新儒学与新儒家的自我超越：一个致广大与尽精微的追求》，载《新儒家评论》第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比,当代新儒家具有清醒的自我批判意识。传统儒家虽然也不乏自我批判意识,但他们或立足于儒学内部不同学派之争,或是以解释角度的转换隐约地传达自我批判的功能,或是情绪化的宣泄,他们不可能从整体上考量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不足。而现代新儒家则在现代视野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对传统儒学的不足从整体上给予了反省。如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勱、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在这一方面就比较有建树。(2)传统儒者没有对整个儒家思想系统进行层位化处理,而现代新儒家则在现代学术视野的观照下,受西方学科分殊的影响,对儒学系统作出了层位化区分。他们将政治化儒学(或制度化儒学)与学术化儒学、儒学的时代意义与恒常意义区分开来,以发现儒学的内在本质和真实价值。不过,这两点“新”是外在的新,它之所以是外在的,因为它无关乎儒学义理生长本身、即不是儒家义理自身成长起来的新。正如颜炳罡教授在其专著《当代新儒学引论》中指出的:“遥契古圣往贤的义理誓命并进而开出之,才是当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真正意义。”^①这种“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顺应儒学的内在精神,重新调整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即本“内圣之学”以解决“新外王”。(2)在思维方式上,当代新儒家之所以新,在于它由儒家的“圆而神”的智慧始,通过融摄西方文化“方以智”的智慧,重新达到新的“圆而神”,即将西方文化概念性、逻辑性思维的智慧内化为儒家的智慧。这一方面以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贡献最大。(3)当代新儒家将传统儒家的心性之学或曰义理之学进一步提升为“道德的形上学”,使儒家哲学实现了专业化和学科化的转向。(4)当代新儒家在传统儒家以仁为主、仁智合一的文化模型中,

^① 颜炳罡:《当代新儒学引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开出了“智”的独立意义，力图建立起新的学统即科学知识之统。当然，颜炳罡教授的这一关于现代新儒家的定义与定性是根据第一、二代现代新儒家的特点作出的归纳，由于杜维明等第三代现代新儒家还处于思想发展期，学思特点表现得还很不充分，因此，其“新”的特点并没有在颜炳罡教授的定义中得到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地说，在现代社会，凡认同于儒家的心性之学并积极地探询其现代转化的学者就可称之为现代新儒家。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杜维明本人，都认为其是继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港台新儒家之后的又一现代新儒家学者。将其归入现代新儒家的阵营并不是世人的枉自拔高或贬抑，而是取决于杜维明自己的学思历程。与另一位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刘述先由于受到其父亲的影响而走上阐发儒学的道路相比，杜维明受其老师的影响较大。他在自述中曾说：“在台湾的中学时代因受周文杰老师的启蒙而走上诠释儒家传统的学术道路”，“而在东海大学亲炙牟宗三和徐复观的教诲才是促使我体悟探究儒家人文精神的本质理由”，尔后负笈哈佛，“以比较思想史为范围集中探索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①此后的三十年多年中，他立志做儒家精神的传承者和见证人，以儒学研究为终身志业，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风雨兼程，矢志不渝地探究、注释、传播儒家文化，为儒学的发展不懈陈词。无论何时，杜维明都毫不掩饰在生命情调的抉择中对儒家的钟情，他不但“愿意把自己探索文化认同的努力刻画为具有‘儒家’特性的学术工作”，^②而且“从来没有怀疑过儒家的时代意义，也从来没有忧虑过儒家的内在价值，这固然与师承有密切的关系，但我总觉得亲近儒家，接

① 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文版代序。

② 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导言》，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

受儒家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然归趋。”^① 不单如此，他还有着归宗新儒家的自我认同的谱系：那就是“认同从孟学发展而来的心性之学”。^② 在其看来，儒家的心性之学是他的“定盘针”，他的“掌舵人”：“以儒家身心性命之学为终极关切本是我们少年时代就已厘定的方向”，^③ “对我个人而言，儒家的心性之学不但是哲学思想而且是宗教体验。”^④ 这不但帮助他超越了一个普通人由于在台湾受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考试教育”所带来的必不可免的限制，更使其避免了同时代人所遭受到的“认同破裂”的袭击。因此到哈佛后他一仍其旧，坚持进行推动道（基础理论）、学（系统分析）、政（具体实践）三途并进的儒学研究。

在现代社会，虽然认同于儒家的心性之学是将其归入儒家阵营的主要依据，但是与前辈现代新儒家相比，杜维明等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又呈现出“新”的特色。对此问题，杜维明有过专门的论述。他本人认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现代新儒家所说的文化传统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了新的特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本根绝不只是宋明理学，而是孔孟以来的全部儒学优秀传统；当然，这个本根已非纯粹的儒家传统，而是经过近代各种思潮对话交流甚至近代西方启蒙冲击后的复杂存在，因为我们在追本溯源时已经无法回避康有为等人对儒学的改造和五四时期新文化派对儒学的全面批判，而这些历史其实是造成儒学进

① 杜维明著，岳华编：《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② 朱汉民、肖永明选编：《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③ 杜维明著，岳华编：《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597页。

④ 同上书，第29页。

化发展的生长点，这也可以为现代儒学与传统儒学的区别提供一个背景资源。”^①其次，现代儒学的“新”又源自于它所处的时代状况以及所要针对解决的时代问题，无论是在中国本土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儒学所面临的境遇都迥异于宋明时期或更早的古代。在中国和文化中国的范围内，儒学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是如何充分、合理、有效地调动传统资源，实现现代意识的本土化。综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经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完全抛弃原有文化传统之后去接纳现代文明，而是恰恰相反，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性都有因传统因素的塑造而形成的迥别于他国的特色，就算是最典型的西方现代国家，如英、法、美、德诸国，他们的民主与法制传统也各具特色。所以，新儒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文化中国提供实现现代化的最有效的传统资源，同时发展儒家化的现代民主、法制等。而另一个任务则是，努力促成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为消除以西方价值为模本的现代性中的诸种弊端和隐患提供有效的资源，为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儒学已非一国的固有传统，而是全球的公共资源，它在今天所处的境遇已迥异于传统儒学。正是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第三代现代新儒学的“新”体现了不同的特色。

二 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新特色

宣扬儒学的复兴和发展，是自本世纪 20 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几代人基本的学术使命。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主张也不断发生变化，其总体趋势是由保守到开放，

^① 蒋广学：《儒家人文精神与现代启蒙心态——燕园访杜维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8 年第 3 期。